

## 弘毅之士，任重道遠

◎ 資中筠

李慎之先生的逝世，在國境內外引起的反應之迅速和強烈、惋惜之痛切，為近年來德高望重的老人、名人逝世所少見。這是來自一種思想和精神的感召力，同時也出自對他的境遇的同情和不平。與他生前有所交往的各輩人等對他的稱呼不一，我一開始就稱他為「老李」，生前如此，本文也不再改口。他倒下得太快，去得太突然。直到今天我總是無法想像他已永遠離去。

老李的平生遭遇在他那一輩的有理想、有思想的知識份子老革命中頗為典型：少壯慷慨悲歌，滿懷救國之志，投身革命，為實現自由、民主、共產主義理想（當時在他們心目中這幾項並不矛盾）；革命勝利初期被委以重任，意氣風發準備一遂平生志；然後就是一連串的打擊，有早有晚（有人在延安時期就經歷了政治審查的煉獄）；然後劫後餘生迎來改革開放新時期，在不同程度上重新擔起一定的職務，又是癡心不改，再次鞠躬盡瘁。不過此後二十年的風雨中各人的情況、取向就大不相同了。老李的貶抑從1957年反右開始，直到1979年復出，但在1989年的風波中又未能倖免。所以從1949年起到他於2003年齋志而歿，正常工作的時間先後加起來只有十八年，以共和國五十四年計，還不到三分之一。能不長使英雄淚滿襟？這種生命的浪費當然不只是他個人的，也是我們民族悲劇的一部分。

聽他家人說老李在醫院中直到最後不能開口之前，還通過電話與朋友討論世界大事，以至於大家對他的康復一度估計比較樂觀。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，不這樣，就不是李慎之了。我在4月上旬從外地回京聞訊趕到醫院看他時，他已進了監護室，從此再沒能開口。據說此時他腦子還是清楚的，只是不能說話。由於一切來得突然，他沒有留下遺言，最後一刻他在想甚麼，永遠無人知道了。

但是他平生一直在想甚麼，卻是昭然若日月的，概括起來就是中華民族的前途。毋庸贅言，老李是堅決擁護開放改革的。他在新的一輪「啟蒙」中站在思想前沿。世人皆知他上反專制主義，下反奴隸主義，倡導民主、自由，認為國人「啟蒙」遠未完成，並以此為己任。有人奉之為「自由主義」帶頭人，有人責以「全盤西化論」。知之罪之，他的文章俱在，不必我來置喙。我個人體會到他氣質的另一面卻是非常「中國的」。他有深厚的國學底蘊，給他個人的道德、文章兩方面都提供了豐富的資源。他基本上是繼承了「經世致用」、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，有兼濟天下之志，而決不甘心獨善其身，無論「窮」、「達」，都是如此。

在政治思想上他強烈主張平等自由，而在個人修養、待人接物方面，卻有許多「舊道德」的規範和底線，許多已經成風之事，在他看來屬於「君子不為也」。他曾告訴我，在剛被打成「右派」時，內心極為痛苦，幾乎不敢聽他最喜歡的貝多芬的《命運》交響曲，因為那主旋律分明是在說「不要檢討，不要檢討」！最後他卻是用的孟子的「動心忍性」，達到一種自我克制。他不止一次提到「動心忍性」，大概他委屈不得伸張的時候居多，這是他在高壓之

下可以動用的一種道德倫理的資源。後來他看穿了各種在「革命正統」的名義下實際禍國殃民的荒謬政治，忽然悟出：以他們的這種標準，我就是「右派」，從此涇渭分明，也就心安理得，不再痛苦了。他主張平等，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又頗重「長幼有序」（不是指官位級別），在有比他年資長者在場時，我很少見他旁若無人高談闊論。這是一種本能的修養。他對人的第一印象很看重「談吐儒雅」，彬彬有禮。當然有時他也承認看走眼，因為有的談吐儒雅者其實文化修養並不高，情操也不一定儒雅。順便說一句，他不是詩人，也不常以詩示人，但我偶然見過他寫的舊詩，驚異於其格律之嚴謹，風格之典雅，方知他這方面也有相當造詣，也就難怪他提起有些號稱會寫詩的高官時常常搖頭了。他喜歡引的一段《論語》是：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！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！」從他一生的行藏可以看到這段話已經溶入他的精神。

他也曾有過居廟堂之上的經歷。在他前八年後十年短短的兩次「出仕」期間，曾經三次隨國務院最高領導出訪，起過高級謀士的作用。尤其是第二個階段，在對外關係、對台工作方面他離最高決策圈是相當近的，而且曾參與十二大政治工作報告中有關外交方面的起草。他確實有中國知識份子的「雖九死其猶未悔」的精神，但在那個時候並沒有屈子的悲壯情緒，也不是孔子的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，基本上是樂觀的。在當時的政治空前開明的氣氛下，他的見解、學識剛好得其所，本以為是可以大有作為的。

1980年以後他調到社科院，奉命創辦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，隨後任社科院副院長，主管「國際片」的八個研究所。在那段期間，他基本上述而不作。他自己說對美國所「情有獨鍾」，但他又常說他其實興趣不在專門研究美國。建美國所是他復出後凝聚很大心血辦的第一件事，同時他的復出是由於改革開放帶來的機遇。可以想見他辦美國所決不單純是為了學術探索，而是與推動改革開放，促進現代化相聯繫的。美國對於他來說，並不只是一個國家，而是一種符號，代表著一種價值體系，一種參照系。同時他又反對把美國研究定位於為政府寫對策報告，而提倡對美國本身各個方面作科學的、客觀的、深入的學術研究。我在馮友蘭先生的著作中發現哲學家是「全民族的智囊」之說，就在〈中國的美國研究〉一文中借用了這句話，認為同樣適用於美國研究。此文登載於《美國研究》創刊號。老李對這一提法頗為讚賞，後來在很多場合提倡。從他後來的實踐來看，他不愧為民族的智囊，當然其範圍遠遠超過美國研究，這也就是他所說的興趣並不在於研究美國。

1989年天安門事件是一個轉折點。關於他那時的言行有許多傳說，不少是穿鑿附會。例如說他曾與學生一道上街到北京市委門前喊口號之類。這決不是事實。這不僅是一個細節的誤傳，我認為是對他為人的一個誤解。他的確不贊成戒嚴，更反對武力鎮壓，但是他從理論上對街頭政治有自己的看法。以他當時的實際職責，也決不可能去上街喊口號。相反，當時社科院多位領導都不在北京，他剛好留守在家，本著一貫高度的責任感，以保衛社科院，維持秩序為己任，一層樓一層樓地巡視。老李的文人氣使他不同於一般的「老黨員」，他的表達方式是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，因此常常以言獲罪；但是他在行動上決不是魯莽漢（他在自述中說自己是「膽小鬼」，當然又是誇張修辭，指行動謹慎則是符合事實的）。他在工作中有關政策問題的掌握從來中規中矩，我除了學術工作外，在對外交流，特別是對美、對台工作這一面與他接觸較多，他從來沒有出過格，犯過甚麼「外事紀律」。有的只是比較靈活、藝術，重常識而反教條，能以識見服人，從不使人感到與言無味。他對1989年的風波的態度和情緒實際上代表當時大多數，有人比他激烈得多。由於他對人很少戒備，許多私下隨口說的話，運動一來處處都是話柄。「六四」以後，他在社科院領導層中為重點批判對象（那時的委婉語叫「反思」），一名原來對他常套近乎、尊敬有加的行政部門負責人，轉變了立場，

參加了老李的反思會後表示不滿，說他檢討還掉書袋，用的成語典故人家都不懂。我不知其詳，但可以想見老李決不是故意「掉書袋」，是他自然的表達方式，而且用的典故也不見得太生僻。這個細節給我印象很深，因為那種氛圍我太能體會了，每當強調「階級鬥爭」時，讀過些書的人一開口就令某些人反感。就是他那篇著名的〈風雨蒼黃五十年〉，據我了解，原本也不是為發表的，而是自己發自肺腑的感言，應該與日記差不多，只不過印出來給幾個朋友看看。不知怎地上了網，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後果：一方面，他再次在體制內被打入另冊，進一步遭封殺；另一方面卻在海內外贏得了空前廣泛的聲譽。這是絕大的諷刺。

我在寫〈平戎策與種樹書〉一文（收入拙著《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》）時，常常想到他。他更像辛棄疾和李白，而不像陶淵明。但是畢竟時代不同了，不必哀歎「卻將萬字平戎策，換得東家種樹書」。他退居書齋筆耕不輟，卻不同於悠遊林下以辭賦自遣。因為他可以放眼全球，從這個高度看人類命運，民族興亡，他的讀者遍及朝野。近半個世紀中他逆境多於順境，但是從另一方面看，與廟堂絕緣，處江湖之遠，倒能作更深層次的觀察與思考，他的本色，他的學養可能得到真正的發揮，特別是最後十年，應該說是他思想最閃光的時期。其一貫的追求老而彌堅，想得更深、更透徹，從心態上義無反顧，在時間上也有了更適宜的條件，潛心寫作，留下了可以傳世的文字。實際上他「在野」的十年中接觸面之廣，影響之大遠超過「在位」之時，這是任何禁令都無法封殺的。可惜天不假以年，使他言猶未盡。

當然老李更多是繼承了五四以來對科學、民主的追求。這些見諸文字是大量的，但還有一些是沒有形成文字的即興之論。他在社科院時經常就一個話題即興發揮，或長或短，有時演變為長篇大論；他有教無類，對各種水平各種年齡的人都一樣開講。那時他心目中的研究所可能有點像古代的書院。他退下來以後大約聽到他的宏論的圈子更廣了，包括電話談話。可惜沒有錄音也沒有記錄，其中有許多思想的火花和他親身經歷的有獨特意義的故事，還有許多警句，如水銀瀉地，無法收集。聽眾大概都各取所需，每人在記憶中留住一點，或無形中化為自己的思想營養。

我個人有幸在上個世紀80年代（大約是1982年）在赴美的飛機上第一次巧遇老李，而且恰好座位相鄰。當時都是素昧平生，我孤陋寡聞，竟也不曾聞其大名，社科院有美國所也是那次才知道的。他知道我在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美國，就單刀直入滔滔不絕地談起對各種問題的見解，許多看法在當時十分新穎。對於一個萍水相逢的人如此坦率，沒有戒備，使我吃驚，他完全不打官腔的獨特的語言也使我有清新之感。後來體會到這就是他作風的「特色」，也是少有的本色。那一席談似乎在我長久受到禁錮的腦子裡吹過一陣清風。隨後他把我「挖」來到美國所，我從此得以在他領導下工作，以及兩人都退休以後繼續交往共二十年。這二十年中他對具體問題的看法並非一成不變，我們也並非在所有的問題上看法完全一致，但是我最初的印象始終如一：襟懷坦蕩，議論橫生。總是單刀直入，很少拐彎抹角。時常一語驚人，發人之所未發。他的思想財富當然是屬於眾人的。對我個人而言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，他在關鍵時刻對我的點撥起了「再啟蒙」的作用。他是第一個從不跟我說「要好好改造思想」的領導。相反，他在對我有些了解之後，曾對我說，你應該相信自己決不會不愛國，決不會「立場不穩」，你只要把你所想的寫出來，就是好文章。那是改革開放初期，對於習慣於戴著鐐銬跳舞的我真有豁然開朗之感。我終於擺脫從大學畢業前夕就開始的永遠改造不好的原罪感，得以回歸常識，回歸自我，進入今天的境界，這是受惠於他的。

當然受惠的不止我一個。他沒有研究員、博導之類頭銜，也沒有正式帶過研究生；但是許多人都稱他為自己的導師。他沒有自己固定的專業，卻推動了許多人的專業研究。人們可以同意或不同意他的某些觀點，但是他憂國憂民的赤誠，追求真理的執著，至死靡它。這樣一個

人，有滿懷救國之志，強國之策而無所用；無「越軌」之行而有超常之見，卻屢屢以言獲罪，時至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仍未能免遭「誅心」，受到一種頗有中國特色的軟性封殺，可勝浩歎！說明我們要在精神上實現真正現代化任重而道遠，還需要多少「弘毅之士」為之奮鬥。

資中筠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前所長

---

《二十一世紀》(<http://www.cuhk.edu.hk/ics/21c>) 《二十一世紀》2003年6月號總第七十七期

© 香港中文大學

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，如欲轉載、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，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。